

从东亚战略格局演变看中日关系

文 / 刘江永

东亚地区分为东北亚、东南亚，虽然朝鲜半岛和东盟都非常重要，然而，对东亚地区战略格局影响最大的当中，中、美、俄、日四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美俄日四国关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这四大国关系为主要标志的东亚战略格局，大体上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化。例如，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苏美不同程度地支持中国。20世纪40至50年代，中美苏共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后出现美苏对抗的战后格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东亚战略格局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变动的规律仍在持续。20世纪50至60年代，东亚战略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中苏结盟对抗美日同盟。美日两国1951年缔结《旧金山和约》及《日美安全条约》，日本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建交，与新中国处于冷战状态。1950年至1953年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在东北亚出现了苏中朝与美日韩对抗的格局。20世纪60至70年代，中苏分裂并继续与美日抗衡。1960年日美修订安保条约，把中国的台湾省作为日美安保条约中的所谓“远东”地区，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中国同美日关系紧张。60年代中苏同盟破裂，甚至在1969年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与朝鲜、越南的关系复杂化。而此后美国则看到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机会。

20世纪70至80年代，中美日关系改善并同时对抗苏联威胁。1971年美国总

统尼克松秘密访华，但在向日本归还冲绳时却擅自把中国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了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双方基本上解决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并在首脑之间就搁置钓鱼岛领土争议达成共识。1978年，中日两国再度搁置钓鱼岛争议，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美建交，使中国具备了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外部国际环境。同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遭到中美日的共同抵制。20世纪80至90年代，中美日保持相对友好。中美关系在矛盾中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但不再结盟。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俄罗斯与中美日关系改善，而中美日之间的矛盾显现。1991年被阿富汗战争拖垮的苏联解体，美日与俄罗斯的关系改善，日美贸易摩擦加剧，中美政治摩擦尖锐，围绕历史观的中日政治摩擦开始抬头，中俄则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首次以钓鱼岛为基线划定日本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并宣称不存在同中国的领土争议。台湾岛内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倾向严重。1997年日本与美国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台湾海峡被不成文地暗中列为日美联合应对的所谓“周边事态”范围。

21世纪头10年，美日两国同中国的经贸相互依存加深，但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抬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

美国同中、俄地缘战略矛盾增多，但美国陷入“反恐战争”，难以全面对抗中俄。中俄关系显著增强。2004年日本制定了冷战后的第一个防卫计划大纲，其防范的主要对象转向朝鲜和中国。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俄合作继续加强，美国与日本保持同盟关系的同时，避免同中俄形成全面战略对抗，而中日矛盾则十分突出。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美国推进“重返亚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当年发生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同年末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战略矛头直指中国。在这一背景下，野田佳彦内阁于2012年9月宣布购买钓鱼岛，实现所谓“国有化”。同年底，再度执政的安倍晋三继续推进同样错误的政策，并把重点转向利用钓鱼岛问题突破日本国内战后的自我束缚，包括：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

东亚战略格局缘何“十年一变”

从历史上看，上述力量对比变化与国际关系改组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

首先，在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决定国家兴衰与国家战略的主要自变量因素是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的转型与变更。成功的国家模式、国家道路会使国家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失败的国家模式、国家道路会导致国家由兴转衰。

作为国家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战略模式的变更将决定国家间关系根本性质的变化，外交战略模式的稳定性决定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所谓外交战略模式，其标志之一是结盟还是不结盟。在上述四大国关系中，二战时期美苏建立的反法西斯联盟伴随战后争霸而解体，导致东亚战略格局的重组。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苏同盟其后名存实亡。二战结束以来，美日两国尽管也有矛盾，但仍是四大国关系中最稳定的，其结盟模式迄今未变是重要因素和标志之一。

以日本为例，自1868年至今，日本的社会形态，即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其国家形态，即国家发展模式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明治帝国宪法下，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起军国主义国家模式，不断对外发动战争。1945年遭到彻底失败后开始国家模式转型，在战后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当政者又开始谋求国家模式的再度

转型，对内谋求修改宪法或灵活解释宪法，放弃经济优先，对外开始谋求成为“政治大国”。90年代以来，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经济萧条、传统企业集团模式及终身雇佣制度解体、政局持续动荡、对外战略调整、同亚洲邻国关系矛盾不断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次国家模式转型的失败。

2009年日本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后，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看到了日本存在的问题，曾经意欲纠正痼疾，朝着正确方向实现国家模式转型。遗憾的是，日本积重难返，鸠山的主张遭遇来自日本国内外的巨大阻力，结果执政不到300天便被迫辞职。紧接着，民主党分裂，执政地位弱化，菅直人内阁、野田佳彦内阁只好重新回归自民党原有政策轨道。当前，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为背景的国家模式调整的历史进程仍在持续，其特点是，既不同于以往的军国主义模式，也不同于战后的经济优先模式，而是充满不确定性。

另外，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与大国外交战略调整直接相关，而相关国家领

导人的更迭有可能给国家内外政策带来变化的契机。中美俄日四大国，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领导人执政时期都较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换届大都在8至10年左右。这与四大国关系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调整变化似有较强的关联性。

2012年至2013年，中美俄日四大国领导人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结束，预示着在未来10年内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变化也将随之而来。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成为四大国关系中对立最为严重、矛盾最为突出的一对双边关系。这在二战后半多个世纪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

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而且强力推进日本国家模式向更右的方向转型。在军事上，安倍内阁正着手在2013年内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谋划建立类似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日美将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本未来防卫力量的重心将转向西南诸岛，明显针对钓鱼岛。在外交上，安倍提出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在中国周边地区拉拢有关国家，从而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

日本的对华牵制战略注定失败

从日本国内形势看，自民党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中未获得过半数议席，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明党态度慎重，因而近期内安倍难以实现修改宪法的政治目标。

在国际上，目前，甚至连美国也开始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可能的铤而走险发出警告；对安倍内阁拒绝承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而企图把美国拉下水越来越不满；对日本谋求修改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先发制人军事打击能力等开始持消极态度。

从历史上看，对新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围堵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统统失



2013年10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防长哈格尔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日本举行了2+2会议。就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改问题进行讨论。其后日本首相安倍也加入讨论。

图片来源/Imaginechina

败。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当年，而日本的国力则远不能与当年的美苏两个超级军事大国相比。因而安倍如果企图使日本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在国际上挑头牵制中国的国家，注定失败。

另外，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和各界友好交往与当年没有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不同，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中苏关系也不同。尽管舆论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间彼此的好感度大为下降，但两国之间友好的基础并未消失。

再有，安倍执政以来在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已转化为中国大力改善和加强同周边邻国关系的动力。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访美取得圆满成功，中美元首互动效果明显；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加强了中俄关系；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度总理辛格、蒙古国总理阿勒坦呼亚格访华，都取得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利用多边国际会议之机出访东盟各国，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等国增进了关系，特别是中越在海上共同开发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同欧盟、加拿大的关系也取得新进展。

从近期看，安倍内阁在短暂的三年执政期间能否改正系统性国家战略错误，将决定这一时期的东亚战略格局。如果安倍内阁缺乏纠偏能力而一意孤行，日本必将进一步滑向战略孤立。因为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日本首次出兵台湾140周年，2015年是《马关条约》缔结120周年，日本在历史观和岛争问题上如果顽固坚持错误，势将进一步促成中韩共同对日的东北亚战略格局，甚至连美国也会同日本保持一定距离。一旦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擦枪走火”，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必将相互影响，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程度将比中美冷战、中苏对抗时期更为严重，其后遗症也将更加难以治愈。

着眼未来七至十年，很可能是物极必反。日本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一定会对安倍内阁目前的错误做法说“不”。日本要想在2020年办好东京奥运会，就必须真正解决好福岛核电站事故带来的核污染问题，必须与亚洲邻国改善关系。否则，如果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进一步膨胀，日本政府的政策回旋余地就会变得更小。一旦福岛地区的核污染严重失控，信誓旦旦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的安倍首相将难辞其咎，甚至会导致自民党再度下野。

目前，安倍内阁所追求的国家模式转型已经受阻，未来的日本当政者将不得不努力探寻真正符合本国国情与时代潮流的国家发展模式，并重新调整失败的对华战略。也许只有到那个时候，中日之间的障碍才能消除，中日关系才能实现稳定健康的发展。■

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西南论坛“中国向西开放：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于2013年9月13日~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本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此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本刊有所删节。

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 对中国的挑战

文 / 郑永年（新加坡）

中国的地缘政治包括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如果把地缘政治放到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容里面来讨论，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平衡这两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中国在传统上一直是大陆国家，陆地地缘政治占据国家的主导地位。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日渐一体化，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不重要了；相反，同样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更显现出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国家的统一。在地理意义上，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个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张的过程。中原王朝是国家的内核，逐渐整合边缘地带。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地带整合到体系中的程度自然比较低。中国人常说，“天高皇帝远”。传统上，因为缺少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一个地方离中原王朝的地理距离影响到其自治程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往往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这种地方化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不因为政治上的统一而消失。1949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后也通过经济手段（例如计划经济）、交通手段（铁路、公路等）和文化手段（宣传）等来整合国家。这些手段都有效地整合了国家，使得国家逐渐从传统上的“文化国